

「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數據庫」介紹*

Introduction to the Zenkoku Kanseki Database

高田時雄 (Takata Tokio) **

一、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數據庫介紹

2000 年 4 月，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獻中心改組為「漢字情報研究中心」(2008 年 4 月改稱為東亞人文情報學研究中心)，以此為契機，「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數據庫」([日]: 全國漢籍データベース) 被規劃為新中心的核心事業，於翌年啟動。數據庫的編製組織在名義上是 2001 年 3 月組成的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數據庫協議會，其幹事機關除了漢字情報研究中心，尚有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研究情報中心、國立情報學研究所。但實際上漢字情報研究中心幾乎承擔了數據庫編製的全部工作，設於該中心內的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數據庫編製委員會進行了企劃、技術設計、組織人員輸入數據、數據成品的校對與維修等工作。幸而到 2008 年度為止連續獲得日本學術振興會科學研究費研究成果公開費，迄今為止進展相當順利。據 2008 年 5 月的統計，參加的圖書館有 55 個，數據總數多達 748,585 筆。雖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好成績，但應該說與當初制定的可以綜觀日本國內所藏全部中文古籍的目標相距尚遠，有待今後的努力。

加入數據庫的 55 個圖書館中，最多的是大學圖書館，國立圖書館與地方政府的公立圖書館次之，財團法人等私立的圖書館較少。然而這並不意味著私立圖書館的中文古籍蒐集較少，其實舊幕府時代的諸侯家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舊財閥系統的財團所管理的圖書館，像前田家的尊經閣文庫和岩崎的靜嘉堂文庫等都藏有許多善本，不過要使其同意加入數據庫往往多有困難，結果

就出現了上述的數字。關於中文古籍，日本各地的寺廟神社也有出色的中文古籍收藏，但至今未能對此加以綜合利用，也是因為有同樣的困難。

應該指出的是，在較短期間能夠建構約 75 萬筆的數據庫，是因為有效地利用了各圖書館已有的所藏中文古籍的紙本目錄。不是從頭開始編製數據，而是根據一定的元數據通過向外訂貨的方式來輸入紙本目錄，這是圖書館職員迄今為止的努力，在資訊化時代得到再利用的實例，我們對此深表謝意。而且日本編製的中文古籍目錄幾乎都取法於《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漢籍目錄》或《內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錄》，對我們來說這一點也是非常方便的。我們的數據庫是以前者為基礎編製元數據的，而對於取法於後者的中文古籍目錄，祇要進行若干的補充改正就能加以利用。

對於未有紙本目錄的圖書館，實驗性地請其提供卡片目錄的影本再進行輸入，一橋大學的例子就屬於此類。對於完全沒有目錄的圖書館，則提供元數據，請其據此在所藏圖書館進行輸入數據的工作，為此我們開發了名為「中文古籍記錄編輯」(漢籍レコードエディタ) 的工具。橫濱歐亞文化館所藏的「江上波夫文庫」即屬此類。我們發現這種方法對小規模的蒐集相當有效，另一方面應該也對提高該館員工處理中文古籍的技術多少有些貢獻。

關於漢字編碼，我們一開始就採用 UTF-8 編碼，不僅限於日本國內使用，而是以提供給世界各國使用為目標。為了用日本、臺灣、中國、韓國等任何一種編碼系統都能檢索，我們將各國的漢字對照表加入檢索軟體，

* 本文依據 2009 年 10 月 13 日國家圖書館舉辦之「國外圖書館專業館員工作坊」演講內容修改而成。

** 作者為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

該軟體似還順利地工作。

這個數據庫基本上是一個目錄數據庫，不包括所收各書的詳細的文獻學資訊，但為了便於辨別版本的種類，儘可能附上卷頭的書影。不過圖像的公開涉及版權方面的問題，因此現在付諸實施的僅限於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一橋大學附屬圖書館等的一部分館藏品。儘管如此，圖像也已經超過 1 萬張。還有一部分圖書，被連接到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全文畫像數據庫（東方學數字圖書館），能夠看到書籍的全貌。

近五年來，我們還和國立情報學研究所共同進行實證性的研究，以求與該所提供的日本最大的目錄數據庫“NACSIS-Webcat”之間實現數據的共享。現在中文古籍數據庫有 6,517 筆數據可在“NACSIS-Webcat”上看到，即是這種實驗的結果。

二、日本的中文古籍收藏簡史

（一）流出與流入

全國中文古籍數據庫收錄了甚麼樣的中文古籍呢？既然該數據庫以網羅日本全國的中文古籍為目標，實際上這個問題相當於問日本現在保存了甚麼樣的中文古籍。這也是筆者在開始建構數據庫時就想瞭解的問題。眾所周知，日本收藏了許多中文古籍，其中有不少是僅見於日本的宋元版古籍。為了看這些書，國外的學者們專程到日本尋訪。日本人在悠久的歷史中，接受了中國的學術，同時踏踏實實地建構了自己的文化，這些善本古籍就是如實反映這一歷史的證據。幸運的是這些中文古籍在日本得到較好的保存。

但從古代直到近年以種種緣由傳入日本的中文古籍，並非單向地存留於日本。有不少書籍於明治以後回流到中國，有的還流入歐美各國。明治時期楊守敬與李盛鐸在日本進行的訪書活動，導致幕府末期集聚的許多善本書從日本流出。除了回到中國的書籍，還有些中文古籍連同日本書籍一起被歐美學者帶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哈佛燕京學社在日本蒐書活動的目標中有相當部分

是中文古籍。另一方面，日本於近代以後購自中國的中文古籍的數量大概多於從日本流出的數量。尤其是近代日中兩國書籍的流動相當頻繁，一一追溯確實多有困難。筆者想簡單地談談現在的收藏單位所藏的中文古籍的來歷，包括上述的書籍流動史。

（二）日本圖書館館藏中文古籍的特點

現代日本收藏的中文古籍的內容因圖書館的特色而大有不同。像內閣文庫這樣有悠久歷史的圖書館當然藏有許多可稱為善本的書籍，歷史較短的圖書館往往也會出於特別的原因而藏有善本古籍或大量的中文古籍。這就需要分別考察各個圖書館的設立經過。但繼承了江戶幕府時代各藩藏書的公立圖書館與地方的大學圖書館等處收藏的中文古籍中，和刻本佔了絕對多數，這也是非常有特色的。當然也有例外，山形縣的米澤市立圖書館收藏的上杉家的藩校興讓館的藏書，包括了上杉家的重臣直江兼續的舊藏書，是極其出色的收藏品。以直江舊藏的黃善夫本《史記》為代表的《漢書》、《後漢書》等宋版三史現在被指定為國寶。1970 年代政府購自上杉家後藏於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追本溯源，這些原來是舊藏於米澤的書籍。無論如何，作為日本所藏中文古籍的問題，需要對和刻本另行考察。由於日本許多大學開設漢學以及與其相關的講座，過去的教員、學者等為進行個別研究而蒐集的圖書後來被捐贈給大學圖書館，就有了許多被稱為「某某文庫」的藏書，這些圖書成為現代日本的中文古籍收藏中極其重要的部分。其中有很多是系統蒐集的專業性的書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在學術上是非常重要的。作為戰前專門從事漢學研究的研究所，東方文化學院和東方文化研究所的藏書，在善本收藏上略為遜色，但它們網羅群書數量眾多，遠遠超過其他單位。這些研究所的圖書館在戰後分別為東京大學與京都大學所繼承。

此外，過去日本在國外設立的圖書館中也收藏了豐富的中文古籍，雖然這些書現在不在日本國內，討論這個問題有些偏離正題。其中北京的人文科學研究所與滿鐵的大連圖書館，因與當時的北京圖書館競爭而積極蒐集古籍，其藏書量非常之多。前者的最重要一部分歸於

臺灣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傅斯年圖書館，其餘為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所繼承。後者也有一部分在戰後不久被蘇聯劫去，現藏於莫斯科的國立圖書館，大部分存留於大連圖書館。

還有一些中文古籍是以寫本形式流傳下來的。在刊本出現以前，書籍是以寫本形式流行於世的。作為唐抄本或同時代的日本抄本藏於日本國內的中文古籍反映了王朝時代的學術，有很多書在中國已經散佚，顧野王原本《玉篇》、《文選集注》、《王勃集》、《文館詞林》、《群書治要》等等早已備受矚目。但必須承認這種古抄本多是寺院的收藏，本數據庫幾乎均未予以綜合，是一個極其薄弱的領域。

（三）內閣文庫與德川幕府藏書

為了一窺日本的中文古籍收藏的歷史，下面想追溯幾個代表性的圖書館的歷史及其館藏中文古籍的來歷。首先應該談到的是現在國立公文書館所藏的內閣文庫。內閣文庫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德川幕府的紅葉山文庫，還有一段歷史可稱為其前史，就是關白豐臣秀次（秀吉姊之子、秀吉的養子）的蒐集。秀次於16世紀末豐臣軍隊征服關東之時，將足利學校連同藏書一起移到京都，又將原藏於金澤文庫的包括宋元版的全部藏書、稱名寺的宋版一切經，還有鎌倉的古寺院的墨蹟之類大量帶回京都。其觸手更伸向北方，掠奪了奧州藤原氏施捨的中尊寺的金銀字一切經，現藏於高野山。豐臣家的武將們也極力協助秀次的蒐集圖書，將萬曆朝鮮戰爭時帶回日本的朝鮮本和宋本提供給秀次，現在宮內廳書陵部所藏的北宋版《通典》即是其一。16世紀末日本最大的藏書家無疑是關白豐臣秀次。不幸的是秀次被迫自殺，其後經過關原之戰，德川家康掌權後情況就完全改變了。除了足利學校與金澤文庫的舊藏品被送回關東的舊址，許多書籍歸於家康，後來成為紅葉山文庫的藏書。概言之，日本自古相傳的宋元古槧以足利學校、金澤文庫以及五山的寺院所傳承者為主，再加上萬曆朝鮮戰爭帶回的藏書。其他善本多是近代以後購自中國的。

家康是非常好學之人，聽儒家學者藤原惺窩的講義，起用其弟子林羅山，在學術振興多所用心，還插手

出版工作，印行了所謂的伏見版與駿河版。其中幾乎都是《孔子家語》、《六韜》、《三略》、《貞觀政要》、《周易》、《武經七書》、《大藏一覽集》、《群書治要》等中文古籍。

家康於駿府（靜岡）去世後，其藏書除了被送到江戶城的一部分，其餘分給尾張、紀州、水戶的德川氏三家，就是所謂的「駿河御讓本」。三家的藏書在明治以後分別為私立圖書館所繼承，尾張德川家設立了蓬左文庫，紀州德川家設立了南紀文庫。前者有一個時期被移到東京，戰後不久又回到名古屋，現在歸名古屋市所有，成為名古屋市蓬左文庫對外公開。其藏書加上御讓本，第一代尾張藩主德川義直（家康的九男）又致力於購買新進來的中文古籍，因此有重要文化財指定品等豐富的善本。而紀州家的文庫於明治維新後一度陷於荒廢狀態，德川賴倫在考察歐美後，為各國的圖書館事業深受感動，回國後著手整理家裏的圖書，在東京開設了南葵文庫。開館後又接收了島田重禮等當時著名學者的個人文庫，其藏書頗為充實，在眾多圖書館中大放異彩。由於大正12年（1923）關東大地震使東京帝國大學的圖書館化為灰燼，德川賴倫予以補充將全部藏書10萬冊都捐贈給大學。這些成為現在的東京大學所藏中文古籍的中心。最後要談的是水戶家的藏書世代代保存於藩校彰考館中，明治維新以後亦得以傳承下來，但大部分不幸喪失於戰火中。

再談談德川本家即將軍家的藏書。不用說江戶時代收藏將軍家藏書的紅葉山文庫，還有官學的昌平校的藏書是最為豐富的。於幕府時代唯一的貿易港長崎置長崎奉行，管理所有的外國貿易，同時出現了優先購買必要書籍的機構，有時還從江戶向長崎的中國商人訂貨。尤其是第八代將軍吉宗出於治理政事的需要而積極購買中文古籍。這樣從長崎購買的書籍許多時候幾乎全是新刊的實用書，又接受了諸侯家進獻的古槧善本，紅葉山文庫逐漸具有非常充實的內容。在進獻的書中，豐後佐伯藩之書最為重要，該藩於文政10年（1827）將第7代藩主毛利高標所蒐集的藏書20,758冊獻給幕府，為紅葉山文庫與昌平校所接收。同樣，近江仁正寺藩第7代藩主的市橋長昭亦從其所收集的中文古籍中，選取宋元古槧30部捐贈給聖堂（昌平校）。這些書現在有許多為內閣

文庫所傳承。

德川將軍家以外其他諸侯家的藏書又是如何呢？關於德川氏三家已在上文提到，眾所周知金澤 100 萬石的前田家這樣的大藩當然不用說了，小藩如有好學的藩主也都有引人注目的中文古籍的蒐集。但豐後的佐伯藩與近江的仁正寺藩等是其中最好的，如上所述已為幕府的藏書所吸收。因此關於到幕府末期為止的日本的中文古籍收藏，可以說幕府的藏書在質與量上都是首屈一指的，其收藏之富為今日的內閣文庫所繼承。

附帶說一下，天皇家與京都的朝臣們，在德川時代經濟上相當困窘，但有的也傳承了以悠久傳統為基礎的重要的中文古籍。近衛家是朝臣中的第一名家，其「陽明文庫」就屬此類。近衛家的藏書，自從京都設立帝國大學以來，就作為近衛文庫寄存於大學圖書館，昭和 13 年（1938）財團法人陽明文庫成立後，書籍被歸還給近衛家。當時作為長期寄存的謝禮，有 233 種典籍被捐贈給大學，大學將這批圖書作為近衛文庫加以保存。

明治維新以後，遷到東京的天皇家沒有值得一觀的藏書。因此宮內省於明治 17 年（1884）恢復古代以來的官制「圖書寮」，銳意致力於其整頓工作。這就是現在「宮內廳書陵部」的前身。幸而壬生小槻家捐贈了「官務文庫」（1888），又接受了擔任過幕府儒官的古賀家前後三代所藏的「萬餘卷樓」（1889），還接受了德山毛利家的「棲息堂文庫」（1896）等等，切實增加了善本的收藏。最重要的是明治 24 年（1891）自內閣記錄局接收的圖書。這一批書籍是以幕府的紅葉山文庫的藏書為主，本來應被內閣文庫繼承，由於當時官制變動很複雜，一部分圖書被移交給圖書寮。因此紅葉山文庫的藏書現在分藏於內閣文庫與宮內廳，善本中文古籍也很豐富，上述北宋刻本《通典》是其中的明珠。

（四）國立官立圖書館和一些財團圖書館等的藏書

現在，「國立國會圖書館」可以認為是日本的中央圖書館，明治 8 年（1873）開設的東京書籍館是其前身，明治 30 年（1897）改稱為帝國圖書館。明治 39 年（1906）於上野建成新館，爾來一直在上野，因此作為上野圖書館廣為人知。戰後有一個時期稱為國立圖書館，

昭和 24 年（1949）改組為國立國會圖書館。作為帝國圖書館之時，有過將內閣文庫的藏書移來的計畫，直至今日仍未實現。其藏書最初是以全國各藩的藩校圖書為主的，廢藩置縣時由文部省接收，本來絕不是豐富的藏書，但經過後來購買及捐贈而逐漸增加，現在已有相當的分量。不過無可奈何的是，與內閣文庫及宮內廳書陵部相比仍是稍遜一籌。

國立及官立的圖書館之外，收藏了值得關注的中文古籍的是以財閥等的資金設立的圖書館。岩崎彌太郎的長子、三菱財閥第三代統帥的久彌購買了當過《泰晤士報》記者的莫理循的所謂「莫理循文庫」，「東洋文庫」以此為起點，原來並無中文古籍的收藏。後來文庫主任石田幹之助利用三菱豐富的資金積極購買中文古籍，同時吸收了藤田豐八、小田切萬壽之助、中山久四郎等學者、藏書家的收藏，逐漸顯得壯觀。岩崎久彌的「岩崎文庫」是精通文獻學的和田維四郎所收集，擁有豐富的善本，以出色的中文古籍收藏而有名，這也早就捐贈給東洋文庫了。東洋文庫以收藏許多冊的《永樂大典》而廣為人知，方志收藏也非常豐富。但由於戰後財閥解散，長期在組織上成為國會圖書館的支部，但至幾年前受到三菱的資助又成為獨立的圖書館。

而同樣是岩崎家的岩崎彌之助（彌太郎之弟）設立的「靜嘉堂文庫」，因購買了陸心源的皕宋樓及十萬卷樓的全部藏書而遠近馳名。此外還購買了中村敬宇、島田重禮、竹添進一郎等學者的舊藏書，逐步增加了藏書。可惜的是靜嘉堂文庫未加入我們的數據庫。

大阪的住友財閥自身並未設立圖書館，明治 36 年（1903）成立的大阪府立圖書館是用住友吉左右衛門的捐贈建成的。位於大阪中心的中之島的富麗堂皇的建築物在全國的公立圖書館中也是格外顯眼的。經過第一代館長今井貫一等的努力，接受內藤湖南等住在關西的學者們的意見，致力於藏書的擴充，因此中文古籍的收藏頗有可觀。現在由於大阪府立圖書館內部的功能分擔，以古代典籍為專長的「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繼承了其藏書。

既然談到大阪府立圖書館，筆者想也順便談談「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的中文古籍。該圖書館源於明治 41 年（1908）開設的東京市立日比谷圖書館。從圖書館的

主要特點來看，它是服務於市民的公共圖書館，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當時的日比谷圖書館擔心美軍的轟炸導致民間藏書喪失，編列特別預算進行書籍的疏散。這統稱為「特別收購文庫」（特別買上文庫），其中有岡先仞、市村瓚次郎、諸橋轍次、中山久四郎、實藤惠秀等著名學者文人的藏書，還有最大的中國書專門書肆田中文求堂的藏書，中文古籍的收集富有特色。

（五）大學圖書館

最後想談談大學的藏書。其中格外具有特色並且成為現代日本的代表性的中文古籍收藏單位的是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與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這兩個研究所的淵源在於，利用義和團賠款（所謂的庚款）的特別會計作為東方文化事業的一部分而設立於1929年的東方文化學院的京都及東京研究所。其使命都是關於中國文化與社會的研究。戰後移交給大學的經過各不相同，至少在藏書方面，兩者都繼承了東方文化學院時代以來的藏書。京都的研究所根據所長狩野直喜的方針，重點購買以清代考證學為中心的實用圖書，並且為了迅速備齊大量的參考圖書而著眼於叢書，以30萬圓的價格統一買進天津著名的藏書家陶湘的明清叢書數百種共26,985冊。戰後又接收了松本文三郎的全部藏書與內藤湖南舊藏的滿州蒙古方面的一部分藏書，進一步發展了藏書。另一方面，東京研究所先是買下浙江青田的徐則恂的東海藏書樓的藏書，以雄厚的資金致力於藏書的擴充，據說1967年的管理移交時藏書總數有103,587冊。作為特別收藏品，大木貫一、長澤規矩也、仁井田陞、倉石武四郎等的舊藏書都很重要。

由於篇幅有限，未能一一介紹大學圖書館的中文古籍的收藏，不過如上所述，不少大學擁有著名學者的舊藏書，很有特色。其中關西大學收藏了內藤湖南與其子內藤乾吉的幾乎所有的舊藏書，值得探討。眾所周知，湖南是代表日本近代的學者，據傳「湖南購書不論價」，其藏書的質與量在同時代都是出類拔萃的，後來幾乎全歸關西大學所有。不過，湖南舊藏書中的唐抄本《說文》等國寶級的最善本則歸於武田藥品公司的杏雨書

屋。天理大學附屬圖書館在組織上是大學圖書館，原來是天理教第2代真柱中山正善從戰前至戰後利用宗教法人的優勢銳意收集而成的，富有包括國寶、重要文物的最上等的善本，在這個意義上它成為可以代表日本的圖書館，將其納入大學圖書館的框架內或許有困難。早稻田與慶應等歷史悠久的私立大學圖書館也同樣有重要的收藏品。前者因收藏了國寶的原本《玉篇》而有名，後者有以文獻學為專業的研究所斯道文庫，成為中文古籍收集與研究的一個重要的中心。京都有東西兩個本願寺分別經營的大谷大學與龍谷大學，都有創立於17世紀上半葉的悠久歷史，繼承了總寺院的圖書，在中文古籍的收藏上也是不可忽視的。曾在大谷大學執教的神田喜一郎將神田家歷代蒐集的圖書於其身後一併捐贈給該大學，因此大谷大學在中文古籍收藏方面就更加重要了。

當然此外還有不少圖書館的中文古籍收藏富有特色，不過根據上文所述，應該可以瞭解日本的中文古籍收藏的概貌。

三、和刻本的問題

近代以前，中國舶來的書籍數量有限，而且極其昂貴，因此往往有在日本國內進行覆刻的情況。在日本翻刻的這些書籍一般稱為和刻本。13世紀末到14世紀末廣為印行的所謂五山版也可說是一種和刻本，雖然通常很少將其看作和刻本。五山版是宋元版的忠實的覆刻本，其版本價值極高。迄今為止，關於五山版這一領域祇有日本做過研究，今後應該進一步引起國際上的廣泛重視。到了江戶時代，和刻本的出版更加盛行。這個時期的和刻本多數附有訓點，因而在中國似乎不太受歡迎。但其中也有在中國已經極為罕見的書籍，作為中國出版史的資料也很有用。而且從江戶時代的日本漢學的水平與特質來看，和刻本也是更應該引起注意的。長澤規矩也製作了相當詳細的《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但還不及佛教書籍與醫書，尚不足以窺見其全貌，有待於今後在完善數據庫的同時進行綜合研究。